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08.02.005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8年第53卷第2期(总第217期)
2008 Vol.53 No.2(General No.217)

青春视角下的"莎菲形象"探析
——重读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刘广涛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252059)

摘要: 丁玲笔下的"莎菲形象"自上个世纪20年代诞生以来,其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以及文学史上多次论争所引发的轰动效应,使之成为跨越到21世纪的文学形象之一。丁玲运用独特的"日记体"形式所展开的另类"青春叙事",对都市"新女性"所面临的"青春矛盾"及其"青春欲望"进行了大胆、严肃的深层次艺术表达,帮助人们正视青春的本质以及青春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从青春视角看,《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篇典型的青春小说,该作品除具有传播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价值之外,还具有独特的"青春学"价值。

关键词: 莎菲形象;青春叙事;青春矛盾;青春欲望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08)02-0029-06

《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小说给丁玲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奠定了她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然而,伴随着丁玲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与文学生涯,这篇小说在文学史上也历尽沧桑,饱受争议。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关于"莎菲形象"的问题。"莎菲形象"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以及文学史上多次论争所引发的轰动效应,使得这一人物形象"走出"了具体文本,不但进入了动态发展的中国文学史,而且参与到现当代中国历史的流程之中,成为跨越到21世纪的文学形象之一。在此意义上,"莎菲形象"已经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莎菲现象"。"莎菲形象"何以扣人心弦?人们为何对其褒贬不一?"莎菲形象"又何以流传久远?——笔者试从青春视角对"莎菲形象"进行探析,对《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进行新的阐释。

一、日记体"青春叙事"

1927年秋天,丁玲完成了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梦珂》,发表后受到叶圣陶等文艺界人士的关注与赞赏。同年的冬天,《梦珂》的姊妹篇《莎菲女士的日记》脱稿,在1928年2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后,一鸣惊人。这时候的丁玲不到24周岁,奠定她在文坛地位的成名作由此诞生。而在此之前,丁玲作为文学青年胡也频的妻子,虽然涉猎了许多文学名著但并没有多少文学创作积累,应该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举成名令她本人也有些措手不及。作品问世不久,就有评论者发现丁玲在文学表达方面的欠缺:"可惜作者的文字不熟练,有时写得颇不漂亮。作者好叙述,而少抒发。……作者那样高的天才,不幸为不十分流利的文字所累,真是令人觉得有些美中不足。"[1](P197)那么,《莎菲女士的日记》何以引起读者的高度关注呢?从文体学的角度看,丁玲运用"日记体"小说形式进行"青春叙事",无论从文学形式还是从文学内容方面说,都容易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从而形成文学的轰动效应。

"日记体"小说一般性质的释义,即用日记的形式,表达小说的艺术内容。运用日记进行写作较易掌握,且与人的精神层面密切相关,这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陈平原曾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提到,因为表达自我的强烈需要,使得"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偏爱选择日记体小说。日记体小说既是作者本人情绪的审美外化,也是时代情绪的一种折射。第一人称日记体小说,外形上更接近真实形态的日记。第一人称是体验性、认知性最强的一种叙事人称,它的权威意义在于自我形象的高度"真实",带有相当浓重的自我展示、自我剖析成分。第一人称日记体小说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在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方面具有无可代替的优势。

丁玲采用"日记体"小说的形式进行"青春叙事",属于青春作者以"日记体"方式,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春读者展示一个"另类青春"的私人生活与内心世界,比较容易在青年读者中激起阅读欲望和窥探兴趣。由女性作家参与的中国现代日记体小说创作,是和"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和女性解放同步进行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在文坛上的闪亮登场,改写了真实

* 收稿日期: 2007-10-18
作者简介: 刘广涛(1963-)男,河南省台前人,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女性立场的写作在文学史上总是缺席的历史。说“莎菲”代表着“另类青春”，在于“莎菲”这个具有异国情调名字与“女士”二字相连，隐含着年轻而“另类”的“知识女性”将构成日记的主角——可以说，小说的题目本身就相当惹眼，富有吸引力。“五四”时代是一个呼唤青春、讴歌青春的时代，青年群体或个人冲破“老年本位”占绝对优势的传统文化，在时代的大舞台上尽情展示着现代青春文化的活力与风采。“青春”，成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新词汇、新概念，大量涌进报纸杂志和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五四”运动落潮以后，以青春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并未减少，只是加重了感伤忧郁的苦闷成分罢了，“青春叙事”依然具有吸引读者关注的阅读效应。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青春叙事”具有鲜明的“性别叙事”色彩，强烈的女性青春意识的凸现，使这篇作品棱角分明个性张扬，甚至招来不少非议。丁玲以其大胆、决绝的青春反叛情绪塑造了莎菲这个叛逆的女性青春形象，尽情地嘲弄了男人们的委琐和卑劣，并将他们从中心地位拉下来而以女性取而代之，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女权意识和反叛意识。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两性地位已发生了重大的置换：莎菲在两性交往中总是主动，总是有着优越感，并居于审度一切的中心地位；相反，莎菲所接触的男性则居于被审视的从属地位：安徽男人粗俗，云霖呆拙，苇弟委琐，凌吉士卑劣。《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描写了“被莎菲观看的凌吉士”和“看了莎菲的日记，也永远不懂莎菲的苇弟”。虽然凌吉士是个美男子，“修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尤其是他的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实在是惹人的小东西。但最后莎菲还是放逐了对凌吉士的感情，无疑是由于对他内在灵魂的鄙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莎菲是一个敢于向男权文化传统宣战的青春叛逆者，一个有着鲜明的女权意识并大胆地解构男性神话的现代女性。“五四”时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反封建、反传统的狂飙突进时期，也是中国女性解放的重要历史时期，生逢其时的丁玲以她的深刻与敏锐，走在了时代的潮头浪尖，成为中国女权主义写作的一个源头，由此我们足见青春丁玲的前卫和深刻。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青春叙事”还包含“身体叙事”和“病态叙事”的丰富内容。“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物存在，更是一个社会文化建构。身体能够感觉到痛苦和快乐，也能够成为思想的对象。身体的到场有一种意思，即在文明和愚昧的冲突中争取个体对自己的身体的所有权与支配权，以表达对婚恋自由、生死自由、精神自由的追求。身体能感觉到痛苦和快乐，自然成为思想的对象。泪水、疲倦、睡眠、病态、死亡等相关传达感受的词汇，都可以看作主体心灵挣扎的生存图式的呈现。当代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中指出：“任何形式对社会规范的背离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病态”。如果一个女性生活在传统社会而又无法遵从传统道德规范、无法担当传统女性角色，那么，她极有可能不仅精神痛苦，肉体也会经受灾难，最终会陷入沮丧、忧郁和疼痛的“病态”之中。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青春莎菲的身心其实都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病态”之中：她肉体上感觉“头痛”并“咳嗽”，精神上“烦恼”、“焦躁”，心绪不佳。医生警告躺在病床上的莎菲不要阅读、不要思考，这不仅限制了她的行动还控制了她的思想。莎菲感觉到被动、压抑、窒息与幽闭，她不但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反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限制、胁迫和伤害。莎菲的疾病与她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身体和精神状态隐喻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被动地位和弱势处境。由于受疾病的限制，莎菲必须躺在病床上，但是她的行为却表明，她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作为一个病人的命运。她不仅在病床上辗转反侧，寻求最佳位置，释放病痛的折磨，而且试图通过寻找新的住所和搬家来改善她的环境及她的内心生活。茅盾先生在评论莎菲这个角色时曾指出，“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背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然而，莎菲的“绝叫”并不仅仅是表现在声音上，这一“绝叫”更是以其女性病态身体作为特殊载体表达出来的。莎菲的疾病及其病体在表达其“创伤”时负有特殊的使命和意义。莎菲精神上“烦恼”、“生气”、“焦躁”和她肉体上感觉“头痛”并“咳嗽”，虽然文体没有直截了当地标示出传统社会对一个“新女性”的压迫与摧残，但疾病作为身体语言，确实产生了一种文化效果。《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身体叙事”和“病态叙事”大大丰富了其“青春叙事”的社会文化内容和心理内容。通过“身体叙事”和“病态叙事”，作者将莎菲还原为真性情、有个性的血肉丰满的“青春”人物，改变了在中国几千年的正统文学中，缺少“肉的气息、血的腥红和神经末梢的颤悸”的境况。有论者从“青春叙事”的角度中肯地评价了丁玲的这篇成名之作，认为《莎菲女士的日记》中34则日记“事事从身历处写来，语语从心坎中说出“，把青春女性感情中的复杂心态和性爱追求上的隐秘思想进行了彻底地裸露和曝光。不管是莎菲所处的时代，还是思想观念已开放的今天，要一个青春女子如此坦诚地将“爱与被爱”、“灵肉分离”的真实感受公开出来，都是很不容易的。当代作家马加回忆了半个世纪以前阅读《莎菲女士的日记》时的感受，他说：“我为什么喜欢读《莎菲女士的日记》呢？因为当时我是青年人，我有着时代赋予青年人的敏感、苦闷、憧憬与追求。……（作品）在青年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在发掘灵魂的深处，塑造女主人公矛盾复杂的性格方面，都达到了应有的高度。”[2](170) 马加以阅读主体的青春身份为出发点，解释了青年读者群钟爱《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代原因与青春心理因素。

总之，独特的“青春形象”、另类的“青春叙事”，这是《莎菲女士的日记》自身内容上所占的优势；另外，作者所具有的真诚的青春品格也是感动读者的重要因素；加之真实可感的“日记体”形式的魅力，使得《莎菲女士的日记》问世后以相当的传播“热度”给文坛带来一定的冲击波，迅速奠定了一位文学新人在现代文坛上的地位。

二、新女性“青春矛盾”

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以“日记体”形式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进行“性别叙事”或“青春叙事”的“日记体”小说，并非只有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如下“女士日记”系列：《一个情妇的日记》（庐隐）、《C女士的日记》（冯铿）、《一个妇女的日记》（黄药眠）、《一个妇人的日记》（沈从文）、《流浪少女日记》（吴似鸿）……还包括丁玲本人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二部。上述小说同样采用了日记体形式，也涉及“女性叙事”或“青春叙事”的内容，且不乏吸引人的题目，但却没有取得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一部）的轰动效应和文学史影响。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除了“日记体”形式的“青春叙事”之外，《莎菲女士的日记》必定还有其他方面的成功要素。笔者认为，其要素之一就是这篇作品深刻地揭示了20年代末期“新女性”所面临的种种“青春矛盾”，这恰是上述其他“日记体”小说所不具备的。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新女性”概念是由“新妇女”发展而来的，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在不同时代也各有差别。“五四”时期的“新妇女”形象是“娜拉”型的，她们纷纷走出父权制下的封建“大家庭”，通过自由恋爱建立男女平等的“小家庭”。20年代末期的“新女性”比起“五四”时期的“新妇女”更加“另类”，她们反叛社会的行为更加极端甚至有些玩世不恭，因此这一时期的“新女性”在许多场合下往往被称为“摩登女郎”。在婚恋和性爱方面，她们信奉恋爱至上并大胆追求性爱，有的坚持独身，有的拒绝养儿育女；在外貌和行为方面也表现出反抗世俗的特立独行。这一时期的“新女性”更多地表现出与西方女权主义精神血脉的相通性，而中国20年代末的社会现实环境和文化氛围是相当严峻和冷酷的，并没有为“新女性”们提供多少生存的物质和精神空间。这一时期的“新女性”不仅受到封建文化的攻击，甚至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贤妻良母”派、“小家庭”派和“职业”派的女性们也对她们进行非议和指责。因此，经受过“五四”精神启蒙和西方文化洗礼的20年代末的中国“新女性”可谓生不逢时，她们处于种种矛盾和诸多压力的包围中，如同划过夜空的流星，只留下瞬间的光亮便消失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女作家丁玲不失时机地为20年代末期的中国“新女性”描摹了一幅生动的肖像，并对其面临的各种矛盾进行了形象而深刻的文学描述。有研究者指出，丁玲在走向左翼作家道路之前的早期作品中，曾专注于“摩登女郎”苦恼的表现，与左翼话语的主导方向并不尽一致，日本学者江上幸子将丁玲视为“摩登女郎”的代言人。[3](P56)可以说，在表现20年代末期“新女性”的青春矛盾方面，丁玲的贡献是独特而巨大的，甚至无人可以取代。正因为如此，“莎菲”形象曾一再受到“非议”，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斗争中，姚文元、周扬等都曾以批判“莎菲”为借口，对丁玲进行过人格侮辱和政治攻击。[4](P414－415)丁玲在《谈自己的创作》一文中写道：“……1957年有个叫姚文元的小编辑，投左倾之机，写了几篇文章，得到某些人的欣赏而跃上了文坛。他判决莎菲是玩弄男性。居然有些理论家和少数落井下石的人，跟着狂叫了一阵。……也有人说，那个玩弄男性或者讲性爱的莎菲就是作者自己，要我去受莎菲的牵连，这很可笑。”[2](P70)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学史存在，足以说明一个问题：作家和他所创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往往有着血肉联系，甚至灵魂的相通。丁玲与“莎菲”形象患难与共的故事，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在某种意义上，把《莎菲女士的日记》作为丁玲的代表作不无道理。“新女性”“莎菲”是一个复杂的青春形象，可以说她成了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首先，分析莎菲这一“青春个体”和社会的矛盾。

莎菲所居住的“公寓”象征着家庭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桥梁。住在公寓里的莎菲离开了家庭，但并没有真正地走向社会或者说社会还没有真正地接纳莎菲，因为此时的莎菲没有职业又没有成家，是一个社会“边缘人”的角色。虽然受过教育却找不到职业，因此也就没有经济来源，就不能真正地融入社会，这是沙菲极大的苦恼。就其社会文化意义而言，“青春”是一个过程，一个时期，是一个由不成熟向成熟发展的“成长”过程。青春处于由少年到成年的一种过渡状态，此时社会不再把青春期的人看成是一个儿童，但他又不完全符合成人的地位，因此，又有“边缘人”之称。莎菲这位“边缘人”的生活状态怎样呢？有研究者提醒读者注意莎菲的经济地位：“她有的只是‘破烂的手套’，‘破旧的拖鞋’和‘一些旧的小玩具。而她的思想意识，她的孤寂、苦闷、感伤、颓废……甚至她的一颦一笑，简直无一不可以从她的这个实际的社会经济地位中找到根据和解释，无一不和她的这个实际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4](P468)莎菲所处的那种“公寓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莎菲的情绪，既是莎菲烦恼的重心所在，又是她反抗社会的导火索。请看下面文字：

> 一刮风，就不能出去玩，关在屋子里没有书看，还能做些什么呢？一个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时间的过去吗？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这冬天快点过去；天气一暖和，我咳嗽总可以好些，那时候，要回南便回南，要进学校便进学校，但这冬天可太长了。
>
> 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是在煨第三次牛奶。昨天是煨了四次。次数虽煨得多，却不一定是要吃，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气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点时间，但有时却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气，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7天没玩它，不过在没想出别的法子时，是又不能不借重它来像一个老年人耐心消磨着时间。[3](P43)

一个充满活力的青春生命，呆坐在公寓里，甚至靠煨牛奶来消磨时光，这实在是青春生命的浪费。青春生命像老年人那样“耐心”消磨时光，这是莎菲“公寓状态”的荒诞性所在，也是莎菲和社会的矛盾所在。这样的青春生命状态，是很容易产生孤独和颓废的。丁玲的写作行为本身，就是对那种“公寓状态”的反抗：“我那时为什么去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须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这社会一个分析……因为我只预备来分析，所以社会的一面是写出了，却看不到应有的出路。”[6](P381)日本的丁玲研究者中岛碧认为，丁玲的初期作品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大半是以“具有近代教养，在自我意识中觉醒，有敏锐的感受性而又无法找出人生的明确目的和方向，因而抑郁烦恼的年轻女性为主人公。她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敏锐地觉察到了时代闭塞的状况，略微沾染了世纪末的颓废，在官能和理性的纠葛中痛苦烦恼而又无能为力，浪费着自己年轻的生命”[7](P170)。还有什么浪费比青春生命的浪费更能令人痛心，更能令人同情呢？因此，莎菲的生命状态受到很多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是不难理解的。

其次，分析莎菲“爱情选择”中的矛盾。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具有绝对话语权的传统社会，青年根本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力，女性青春则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的“新女性”经过“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启蒙，加之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横向影响，她们把爱情奉为神圣，在男女公开的社交生活中，表现出大胆主动的进取姿态，往往把男性置于被选择的地位。接受过现代教育的莎菲认为，女人和男人在精神人格、社会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莎菲不像传统女性那样被动地等待男性的垂青和爱怜，而是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在不同的男性间区分、选择对象，表达着对女性自我意欲的坚持和肯定。莎菲的身边有两位截然不同的爱情“候选人”：一位是比莎菲大四岁却甘心做她的“苇弟”的老实男孩，另一位则是风度翩翩的新加坡美男子凌吉士。莎菲希望通过凌吉士获得灵肉合一的完美的爱情，获得新生活的希望。然而，她终于发现在凌吉士那高贵的形体里安置着的却是一个卑劣的灵魂，莎菲深深地失望了，但她一时又难于从情感的迷恋中挣脱出来，为此莎菲常常感到羞愧和痛苦。

选择是一种自由，同时也是一种责任。选择爱情就是选择生活方式，就是选择安身立命的婚姻基础。“莎菲将爱情的感知和选择与自己的人生的道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女性在爱情的选择中对非爱情的因素考虑得更多。无疑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莎菲在凌吉士的真实的感性之美与自己企图赋予他的美好理想之间苦恼。她在这情感的挣扎中，更多的仍是对自己沉湎于感性的自责。”[8](P48)作为20年代末期的“新女性”，莎菲在爱情选择中的犹豫和烦恼，既表明青春自身的不成熟，又流露出对未来生活的担忧。“苇弟”太过老实且不成熟，凌吉士太过成熟以至世故圆滑，莎菲对两位爱情“候选人”最终都投了弃权票。从青春视角看，爱情选择中的犹豫和彷徨是很正常的，青春作为一种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状态，正是在选择的过程中体验爱情和认识爱情的，因为恋爱本身就是一种指向未来婚姻生活的适应和预备。“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这种醒悟，往往是许多“过来人”在回首青春岁月时所发出的沧桑之叹。初出茅庐的莎菲，在面临选择爱情的自由和责任时，那种兴奋与不安、自信与自卑的青春心理，被丁玲惟妙惟肖地描摹出来了，这应该是丁玲为中国青春文学做出的贡献之一。

再次，分析莎菲“青春”自身的矛盾。

即使抛开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以及爱情选择中的矛盾不谈，“青春”自身也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在青春“成长”的过程中，“自我”的形成本身就包含着矛盾：一方面只有离开“母体”或者“群体”，才能形成“自我”；另一方面，一旦离开“母体”或者“群体”，就意味着个体的孤独。青春期的莎菲正处于“自我”形成的时期，孤独和尴尬总是难免的。那种“公寓状态”似乎也象征着莎菲心理上的“边缘”状态：一方面渴望人们体贴她，一方面又对人们盲目的体贴表示反感，甚至会逃避群体，下面一段描写就能说明问题：

> 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所爱惜我的是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我真愿意在这时候会有人懂得我，便骂我，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了……
>
> 没有人来理我，看我，我是会想念人家，或恼恨人家，但有人来以后，我不觉得又会给人一些难堪，这也是无法的事。近来为要磨练自己，常常话到嘴边便咽住，怕又在无意中刺着了别人的隐处，虽说是开玩笑。[5](P45)

《莎菲女士的日记》围绕莎菲形象设置了蕴姊、苇弟、凌吉士、云霖、毓芳、剑如、安徽人、同乡等人物。这些人物中属于“庸众”的有剑如、安徽男人、凌吉士等；属于“好人”的有蕴姊、苇弟、毓芳、云霖、金、周、夏等。莎菲同这些人的交往基本上是不即不离，唯一一个精神上的知己蕴姊又不在身边，只能以书信的形式交往，后蕴姊英年早逝，这样莎菲身边虽不乏友人，却每每有一种处于人群中的孤独感。莎菲选择恋爱，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摆脱那种无处不在的孤独感。我们知道，“自我”形成中产生的孤独感正是青春成长的必要的代价，在精神意义上具有“成年礼”的意味。“成年礼”作为考验青年人正式进入成人社会的一种仪式，在一些原始部落里非常盛行，往往采用一些严厉而残酷的手段折磨其肉身或心灵，经受住考验的青年人才有资格得到成人社会的认可和接纳。现代社会的“成年礼”一般只具有精神上的象征意义，但通常是每个成长过程中的青年人所必经的历练心灵的门槛。20年代末期的“新女性”莎菲也并没有例外，她所经历的一切痛苦迷惘、失落与挫折，对其日后走出“公寓状态”，进入社会大舞台具有某种预备或见习的意义。《莎菲女士的日记》结尾，莎菲痛苦地认识到，“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这是莎菲对“自我”和“青春矛盾”的一次深刻感知和理性认识。

> 但是我不愿留在北京，西山更不愿去了，我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无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因此我的心从伤痛中又兴奋起来，我狂笑的怜惜自己：
>
> “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啊！我好可怜你，莎菲！”[5](P181)

《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个结尾，曾引起许多读者和评论家的误读：以为莎菲绝望了，甚至就要堕落或者自杀了。细读这个结尾，其实作者有一种暗示隐含其中，那便是，尽管不清楚自己的未来何在，但是青春莎菲已经决定要走出那种“公寓状态”了，所以莎菲的心“从伤痛中又兴奋起来”。具有象征意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义的“公寓状态”的结束如同娜拉“砰”的一声关上家门走向社会，有一种觉醒或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意义存在。“她（莎菲）说：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但她的精神，她的心灵并不甘心，所以她是苦闷的。她叫喊：我要死啊，我要死！其实她不一定死，这是一种反抗。那时候，这种女性，这种情感还是有代表性的。”[4](195) 事实上，在第二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具有反抗性格的“新女性”莎菲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女作家丁玲从骨子里了解莎菲，了解莎菲复杂的青春矛盾，也了解20年代末期“新女性”的时代性格。“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更懂得女人的痛苦。”[9] 从某种意义上说，丁玲选择莎菲或者莎菲选择了丁玲，是一种青春和青春之间的对话，这种“日记体”对话固然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但其超越时代之上的“青春学”价值则更具稳定性和恒久性，《莎菲女士的日记》跨越世纪和国界的生命力就是最好的证明。

总之，丁玲通过20年代末期“新女性”各种复杂的“青春矛盾”的深刻表现，使得《莎菲女士的日记》获得了社会学和青春学的“厚度”，并形成作品独特的“青春学”价值。

三、心理学“青春欲望”

在莎菲所面临的诸多青春矛盾中，“灵与肉”的冲突，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也得到丁玲深刻而有力地表现。丁玲在塑造莎菲形象时，大胆、细腻地进行了青春心理的描写，在描写中真诚而严肃地直面了洪水猛兽般的“青春欲望”，把赤裸裸的青春本色或真相呈现出来，作者以其惊世骇俗的率真姿态，引起文坛和社会的极大震惊。

人是动物，就有动物所具有的生存本能，由本能产生的生理需要就是欲望的本质。人是欲望动物，也是灵性动物，不过人身上的“灵与肉”经常处于冲突之中。周作人在论述“人的文学”这一概念时，强调“人”应该是“灵肉一致的人”，指出“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在周作人看来，人性中包含“灵和肉”两个方面，周作人尤其重视肉的方面：承认人的一种生物性。人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

社会文化意义上的青春指由少年到成年的过渡状态；生物意义上的青春期则指青年人的春情萌动阶段，就动物而言则指其“发情期”。处于青春阶段的青年其原始生命力特别旺盛，欲望也就特别强烈；而既定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则总是以精神文明的方式约束着青春欲望，不允许其越出雷池一步。这样就使得青春生命往往处于激烈的“灵与肉”的冲突之中，从而形成青春期的苦闷甚至心理变态。

正值青春芳龄的莎菲，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其“青春欲望”是相当强烈的，“灵与肉”处于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之中。莎菲知道，“这个社会里是不会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无论这是于人并不损害的事，所以我只得忍耐着，低下头去”[5](P49)。而“欲望”的一个特点就是，越受到压抑或禁止，就越可能招致更强烈的满足要求。丁玲真实地记录了莎菲“青春欲望”的燃烧：

> 今夜我简直狂了。语言，文字是怎样在这时显得无用！我心像被许多小老鼠啃着一样，又像一盆火在心里燃烧。我想把什么东西都摔破，又想冒着夜气在外面乱跑去，我无法制止我狂热的感情的激荡，我像躺在热情的针毡上，反过去也刺着，翻过来也刺着，似乎我又是在油锅里听到那油沸的响声，感到混身的灼热……[5](P78)

茅盾先生在评价《莎菲女士的日记》时，认为“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文中有下面一段描述性评论：“（莎菲）在热爱着而又蔑视她的怯弱的灰色的求爱者，然而在游戏式的恋爱过程中，她终于从腼腆拘束的心理摆脱，从被动的地位到主动的，在一度吻了那青年学生的富于诱惑性的红唇以后，她就一脚踢开了她的不值得恋爱的卑琐的青年。”[2](P61) 茅盾先生的这一段描述性评论相当经典，但却多少有些夸大了青春莎菲的“理性”行为，对其“非理性”内心世界的软弱有所忽略。事实上，无论在凌吉士面前还是离开他之后，沙菲都相当矛盾，更多情况下难以摆脱“青春欲望”所造成的“灵与肉”分裂的折磨：

> 这是爱吗，也许要爱才具有如此的魔力，不是，为什么一个人的思想会变幻得如此不可测！当我睡去的时候，我看不起美人，但刚从梦里醒来，一揉开睡眼，便又思念那市侩了。我想：他今天会来吗？什么时候呢，早晨，过午，晚上？[5](P66)

> 一当他单独在我面前时，我觑着那脸庞，聆听那音乐般的声音，我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住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真的，有时话都到嘴边了：‘我的王！准许我亲一下吧！’但又受理智，不，我就从没有过理智，是受另一种自尊的情感所裁制而又咽住了。唉！无论他的思想是怎样坏，而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是曾有过而无疑，那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爱上了他咧？并且，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要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唉！我爱他了，我要他给我一个好好的死就够了……[5](P74)

对于莎菲的“青春欲望”，丁玲非但没有回避，而且作了大胆、严肃的表达，帮助人们正视青春的本质以及青春存在的诸多问题。丁玲笔下的“青春”更多地带有“非理性”色彩，“欲望”如同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此现象有过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的心理结构有三个层面：“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心理结构最原始部分，体现一个人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本能、欲望。人的“本我”是无意识的，基本上由性本能即“力比多”组成，它按“快乐原则”活动。而“自我”代表理性，按“现实原则”活动；“超我”代表社会道德，按“至善原则”活动。于是，“本我”和“超我”就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莎菲女士的日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记》着力表现的就是莎菲人格结构中“本我”与“自我”、“超我”的冲突，具体表现为“灵与肉”的冲突、“情感与理智”的搏斗。

初登文坛的丁玲能够如此真切、深度地表现“青春欲望”，这同作家的写作姿态、青春立场和女性意识有关。“青春丁玲”按照青春的本来面目表现青春，“女性丁玲”根据女性的特点描写女性，这种写作姿态、青春立场和女性意识决定了作品的质量与品味。在谈到创作经验的时候，丁玲说：“我当初也并不是从站着批判的观点写出来，只是内心有一个冲动，一种欲望。”[10](P3)带着“冲动和欲望”表现青春，当然比带着“面具和枷锁”描写青春更接近青春的本来面目。美国学者夏志清认为早期丁玲“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她最感兴趣的是大胆地“以女性观点及自传的手法来探索生命的意义”[11](P187)。日本学者中岛碧认为，关于“女人”本质，男女的爱和性的意义问题的描写，丁玲“不是从所谓政治、社会中取得妇女解放、妇女权利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她本身也不一定充分意识到了她自己的这些问题”[7](P170)。中岛碧高度地评价了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认为丁玲生动地把年轻女主人公的姿态、气息一起告诉了读者。“在这些问题的描写上，丁玲比她先辈或同辈中的任何一位作家（不论男女）都出色。甚至可以说，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7](P170)与20年代初期郁达夫的《沉沦》相比，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所描写的内容、所塑造的人物有所不同，但却一样是透过主人公复杂的青春心理活动，对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青春矛盾”和“青春欲望”进行了如实表现，反映了初步觉醒的一代青年的精神苦闷。这两部青春小说的成功在于：在现代文学史上，他们率先以现代人的眼光、全新的态度来看待青年人的“青春矛盾”，并把“青春欲望”视为青年的自然天性和人类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综上所述，《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主人公“莎菲形象”，由于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以及文学史上多次争议所引发的轰动效应，已经走出具体文本，在现代文学史上构成复杂的“莎菲现象”。“日记体”形式的“青春叙事”给作品带来文体学上的“热度”；对新女性所面临“青春矛盾”的如实揭示，使作品具有社会学和青春学意义上的“厚度”；大胆、严肃的“青春欲望”的表达，使作品获得心理学意义上的“深度”。初登文坛的丁玲能够如此真切、深刻地表现“青春主题”，这同作家的写作姿态、青春立场和女性意识有关，也使得《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并形成作品独特的“青春学”价值。

参考文献：

[1] 杨桂欣. 观察丁玲[M].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

[2] 宋建元. 丁玲评传[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3] [日] 江上幸子. 现代中国“新妇女”话语与“摩登女郎”丁玲[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2).

[4] 袁良骏. 丁玲研究资料[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5] 丁玲. 丁玲短篇小说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 丁玲. 丁玲文集(5)[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7] [日] 中岛碧. 丁玲研究在国外[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8] 张军. 再读莎菲女士的日记——兼论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 南方文坛，2002，(1).

[9] 丁玲. 三八节有感[N] 解放日报，1939－03－09.

[10] 丁玲. 我的创作经验[N]. 中华日报，1932－02－02.

[11] [美]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The “Image of Sha Fei” As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outh: On Re－reading *The Diaries of Miss Sha Fei by* Ding Ling

Liu Guangtao

(School of Literary Arts,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Abstract: Since the 20’s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image of Sha Fei” characterized by Ding Ling has all along led to a sensational effect with its rich connotations, so that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literary images left over to the present century. With the special form of diary, Ding Ling has profoundly expressed the abnorm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youth” and ”the desires in the youth” confronting the urban ”new women” so as to help people recognize the very nature of youth and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you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outh, *the Diaries of Miss Sha Fei* is a typical youth fiction in addition to its special values for ”youth studies”, and those of transmission,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Key words: the image of Sha Fei; youthful story; contradictions in the youth; desires in the youth

责任编辑：翟得尧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